

旧迹拾遗

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

李 浩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旧迹拾遗

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

李 浩 著



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迹拾遗: 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 / 李浩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520 - 2391 - 6

I. ①旧… II. ①李… III. ①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9014 号

旧迹拾遗: 鲁迅相关的若干人和事

李浩 著

责任编辑: 章斯睿

封面设计: 北 海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62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2391 - 6/K · 458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丛书”编委会

主 编：郑 亚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晓东 邓 军 乐 融 乔丽华

李 浩 吴美华 郑 亚 施晓燕

顾音海 高方英

责任编委：李 浩

封面设计：北 海

目 录

CONTENTS

- 20世纪初上海读书界之一端**
——读《应修人日记》 / 1
- 上海时期的鲁迅所作序跋述略**
——为青年作家而作 / 18
- “文艺自由论辩”及其他** / 58
- 鲁迅与翻译**
——论争、合作及其他 / 74
- 花边新闻**
——《社会日报》的折射 / 111
- 关于丁玲被捕**
——从《摄影画报》角度 / 124
- 《李桦色刷木刻十帧》及其他** / 139
- “赞美人的意志”**
——黄新波的木刻及其油画琐谈 / 152
- 刘岘与鲁迅及《怒吼吧中国之图》** / 167
- “把大众的灵魂叙述出来”**
——司徒乔的创作与生平略说 / 179
-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鲁迅文章手稿所见** / 196
- 时代的同行者——许广平** / 221
- 附录** / 238
- 许寿裳的传记观以及鲁迅传** / 238
- 内山完造：上海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中介** / 248
- 参考书目举要** / 264
- 后记** / 266

20世纪初上海读书界之一端

——读《应修人日记》

20世纪初，上海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造就出一批有闲暇时间、有闲钱的城市职业者，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文化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力量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城市文化的消费者中的一些人也会转化为城市文化消费组织者或文化生产者。应修人就是其中之一。

应修人1900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原名应麟德，字修士（1919年改为修人）。14岁就到上海钱庄当学徒，从此开始了他的上海市民的生活。1926年底，应修人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而离开上海，1930年他又回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在与国民党特务的搏斗中牺牲。据应修人1917年的日记记载，他记日记是始于1916年的端午节，以目前所见的4年日记和所知的应修人生平推测，至少在1926年底他离开上海前应不会中断记日记的习惯，若此，我们所见的1917年、1919年、1922年和1923年4册日记^①只是他10年日记中的小部分。

从1914年应修人到上海至1926年底他第一次离开，这10余年的时间，是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繁盛的城市的重要发展阶段

^① 《应修人日记》一年一册。目前，应修人1917年日记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他3册日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段，当时旧的封建体制已被打破，新的共和体制，受阻于国内的军阀割据势力、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压抑，而未完全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一新体制在上海的租界面前更显得苍白无力。但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文化在经济的推动下也迅速地发展，林立的书刊出版机构促进了市民的文化消费。当时市民的国民意识相对薄弱，因而所呈现的城市文化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对上海市民的国民意识的增强和上海城市文化向真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良好基础。身处其中的应修人在思想上也同样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一位崇尚实业救国的进步青年，转变为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者，新文学的参与者，直至最后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一、一个银行职员的“归农”计划

从现存的4年日记来看，年轻的应修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勇于实践自己理想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当他17岁时，也就是刚从钱庄学徒转变为正式职员时，他就希望自己对国家、对社会有所作为。他的人生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投身于农业，即以农业为实业来达到他农业救国的理想。他之所以选择农业，一方面是当时的应修人与农村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母亲、妻子都住在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农田。同时，他在城市中所工作的部门又恰恰是城市商业经济的最

重要环节——钱庄，城市商业运转的核心，其中所有丑陋的一面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钱庄里给予他的感受与还具有很强烈传统亲情关系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超过了任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表象的对比。另一方面，应修人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美、英、德、日等强国不仅工业发达，而且它们的农业也很发达，他由此认为西方国家的强盛首先是农业的兴盛，同样，中国要强盛必须先要农业发达，农业的发达可以使广大的农民富裕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应修人的这一认识虽不完全正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割据、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但也触及了解决中国经济落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考察，应修人之从农业入手，应比之当时主流的从工业、商业等方面入手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更接近于中国经济振兴的根本。

1917年5月1日，应修人在《自题小影》中



》应修人1917年日记，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这样写道：“空说男儿意气雄，春过二十无微功。生涯今日何堪问，万恶沪滨侍富翁。治国无才当治乡，民生困迫正凄惶。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①应修人所“归”的“农”并非传统意义的上“农”，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涵盖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综合体。他很重视前人经验的获取：“余索观各书店书目，恨农业类甚少，彼又有英文书目，则关于此类尚多。余因思学英文，冀读英文之农业书也。”^②不仅如此，应修人还与同事一起组织“新青种植团”“借豫源银行的屋顶做实验地”；该团“宗旨在练习劳动，涵养性灵，以识自然界的真趣，得植物上的技能”^③。

应修人虽仅受过有限的私塾和小学教育，但上海这一当时中国土地上最富现代气息、与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大城市，以及丰富的图书市场和普及教育场所，给予应修人思考问题的基础、视野和空间。如上所述，应修人之重返农村，其目标并不是回去做一个传统的农民，而是将中国传统的农业变为真正的现代实业，他心目中的农业是结合了“作物、园艺、畜牧、森林诸事”^④多种经营的、使用最新生产技术的、以工商业方式进行操作的现代综合农业。为此，他利用当时上海庞大的图书期刊市场，获得了大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最新技术的信息。在 1917 年和 1919 年两年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应修人购买并研读了《耕种学》《新农业》《农业浅说》《植物学》《肥料学》《农产制造学》以及函授教材等农业书

①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 页。

②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③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6 页。

④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刊,进而通过报刊的介绍多次参加了有关养蚕、植棉、养蜜等农业新技术的报告会,并通过阅读刊物与农业专家尤惜阴先生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具体而有益的指导。在进行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准备的同时,应修人还回乡进行实地考察,与亲友深入而具体地探讨了他的“归农”计划,并筹划建立相应的股份公司,作为他今后实施“归农”计划的基地,设想组建宣讲团向农民传播文化和农业知识等。虽然应修人的“归农”计划最后因家庭的经济变故而未能实现,但若将他的一些具体构想与今天中国农村的经营方式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活在 20 世纪初的、从未亲身体验过外国先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应修人就能作出如此的构想,除了他的个人因素外,当时上海为他提供的大城市所特有的文化信息环境却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

二、促成湖畔诗社的成立

如果说 20 岁前的应修人在制订他的“归农”计划时,受到了上海这一大城市的文化信息环境的诸多恩惠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时间里,除继续享受这一恩惠外,他还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现存的应修人日记中我们了解到,至少在 1924 年前,他对诗、画和书是情有独钟的,在筹备“归农”的时间里,他从未放弃他对这三者的爱好,因此在“归农”计划失败后,应修人自然而然地将这三者作为自身思想的提高和意志的修炼的工具。

应修人对诗的爱好应来自他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在 1917 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与友人唱和旧诗的记录。然而他对旧诗的爱好却没有使他拘泥于传统知识之中,他一方面作旧体



》此照背面有应修人手迹：“西湖去！”应修人日记 1922 年 3 月 29 日记“快邮去静信，附摄片一帧”，疑即此照片。《修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读到的这篇《改良文学议》的宗旨应与《文学改良刍议》差别不大。这篇文章给应修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忙于“归农”之暇“颇思归里后改良歌词”^①了。虽然我们目前所见的应修人最早

诗，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学英文，读新书刊以求得新的知识。在 1917 年 5 月 4 日的日记中，应修人这样记道：“晚取《留美学生季报》春号阅之。夜八时毕事，再阅《季报》，中有《改良文学议》……均佳。改良文学主有八条，有谓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等。斯固可期言文一致，而亦为我侪典不深者所喜也。”胡适在 1917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而应修人所

①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的白话诗是作于 1920 年 1 月,但据 1917 年日记,在这年应修人已经开始试着用白话文与好友通信了。

北方的新文学之风波及南方,这在应修人日记中也有体现。1919 年初,应修人读到最新一期《新青年》,对其的评价为:“这杂志提倡文学革命,改革。青年思想虽有一部[分]过于偏激,大半是很好的。这期是讲戏剧改良的,很多我很赞成。有说‘不论小说、新剧,要有恶结果,或不了结果,才能使人永记’。又说‘不要掺批评的话’,都是很对的。”^①应修人在读了《新青年》后,又去买了《新潮》和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他对《新潮》评价甚高:“这书很好,看了加我很多希望。快活!快活!”^②

应修人在广泛阅读有关农业书刊的时候,就以书刊为媒介,通过通信方式,与尤惜阴先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样,应修人通过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文学刊物,与张东荪、叶圣陶、康白情、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周作人等建立了书信联系。据《应修人日记》,1922 年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应修人代为联系出版事项、催讨版税、出资刻版权章并制印花、^③代为寄赠等诸类杂事。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中,出版较早且较有影响的新诗集,应修人助力康白情的诗集《草儿》之事,似少有人知晓。不过,更少人知晓的应是应修人等

①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4 页。

②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 页。

③ 据 1922 年《应修人日记》,应修人 2 月 15 日接汪原放信,遂为康白情《草儿》定制石章“白情版权”;后因错误,于 22 日改为橡胶章“白情著作之印”。

编的文学刊物《皎月》，这份刊物于 1922 年 1 月出版第 1 期后，应修人被分配负责“小说”“谈话”“讨论”三栏目，^①推测这本《皎月》是应修人联合同事友人合办的，该刊在出了第 2 期之后，就杳无音信了，因此，更具体的信息有待于《皎月》的被发现了。

1922 年 1 月，以中国新诗社名义编辑的《诗》月刊出版，应修人几乎立刻就拿到了，并自定半年，又代康白情定半年。^②借助于《诗》月刊，应修人与汪静之建立了通信联系。他们相互通信未久，汪静之就邀请应修人到杭州游玩。1922 年 3 月 31 日，应修人到达杭州，与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一起游玩、作诗。在 4 月 5 日应修人回沪前，他们“共想四人静、雪、漠、修合组一湖畔诗社，无定期出集子。先出第一集叫《湖畔》”^③。这样《湖畔》就在应修人的筹划、接洽、抄写、编辑中，于 5 月 8 日出版，初印 3 000 本，印刷装订计用 195 元，该费用由应修人一人承担。在诗集出版后，应修人将之寄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康白情、周作人等，更委托周作人设法在北京大学寄售。^④

应修人与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人在杭州组成湖畔诗社，可算作应修人新诗创作道路上的一件重大的事件，它使应修人得到了新诗创作、探讨的共同伙伴，同时在新诗创作、思考上有了更大的飞跃。《湖畔》是自费印刷的诗集，应修人与汪静之、冯雪峰、

①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2 页。

②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5 页。《诗》月刊第一期第一号版权标识该刊为 1 月 15 日出版，而应修人日记记 1 月 3 日购得该刊。

③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3 页。

④ 周作人以仲密之名，在 1922 年 5 月 18 日刊《晨报副镌》上发表短文《介绍小诗集〈湖畔〉》，以为介绍、广告。

潘漠华4人创作诗歌的合集。尽管之前应修人参与合作出版刊物《皎月》，但应修人对《湖畔》倾注了更大的热情，通过各种方式让《湖畔》由同人出版物，变为公共图书，并在中国新文学圈和读者圈产生了回响。由此，应修人真正地由读者的身份转化为文学创作者。借助于当时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加之同时出版的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所引起的争论，湖畔诗社这个松散的小团体成为当时新诗的培育者、创作者、爱好者视野中的一个重要社团，对当时新诗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应修人的好友魏金枝、谢旦如就因应修人的影响而加入了湖畔诗社，其中谢旦如自费出版了他的个人诗集《苜蓿花》(《湖畔》第4集)。

从应修人1922年和1923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他一方面自己作诗，为湖畔诗社出资出版《湖畔》和《春的歌集》，协助康白情联系出版《草儿》和《新诗年选》(1919年卷)，关注新出版的新诗书刊，如《诗》月刊、《冬夜》、《雪朝》等，另一方面他又大量购买《诗经》《楚辞》以及唐宋诗词名家集，经常阅读、背诵。这可能是“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新诗诗人中所有的特殊状态，一方面他们希望打破旧诗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拒绝中国传统诗词的文化魅力。应修人在1922年7月31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很有个妄想创个有中外特长的，适宜与中国字的诗体，因我觉得现在新诗，多像译出来的有韵无韵的诗，很少一些中国原有的诗或俗谣的风俗。”^①这一观点虽不完整，但颇类于后

^① 应修人1922年7月31日致周作人信，《修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来闻一多在《诗的格律》所要求新诗的三美,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可惜应修人后来在此问题上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探讨性文字,^①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试验性诗作。这对应修人的诗的研究和中国新诗发展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三、将图书惠及于更广大的读者

应修人对于上海进步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贡献,当是上海通讯图书馆的创立。从现存的4年日记记载来看,应修人爱好广泛,买书看书是应修人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之一,他的阅读范围广泛,农业、商业、英文、新文学、健身、国民教育、家庭知识、成功学等,期刊包括《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实业汇报》《留美学生季报》等。据1919年《应修人日记》记载,他在1918年图书上的花费占他总收入的20%,是一项不小的支出。青年应修人似乎特别注重《成功人传》。在1918年元旦他以《成功人传》赠诸友,并附诗一首,其中有“少年能得几青春,似水流光岁又新。时不再来徒叹老,胸藏绝学非终贫。”^②句,这表明他借鉴前人的经验、追求人生成功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振兴国家和改造社会出力。“五四运动”后,应修人开始关注新文化的书刊,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以后,他开始阅读有关新诗的书刊以及传统古典诗集。

① 据《应修人日记》记载,他有多本读诗笔记,但至今未见。

②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应修人曾感叹“新书很喜看，但不得抱其精华”^①。他不仅买书，还与好友相互借书看，并共同讨论读书感想。为使自己所购的好书能为更多的友人所看到，他在 1919 年 4 月 21 日设立了“修士书箱”：

造“修士书籍”书目，又做“修士书箱”借书规则，写在书录上。大意说：书目所有，别人未借的，都可自由借。请在借书录上注明，来还也注明。借去虽没限制，最好早看早还。除杂志每回一卷外，其余二种为限。分五条，书共一百十七种，二百九十五本。今天就有四人来借。^②

这便是上海通讯图书馆的雏形。“修士书箱”的设立得到了好友的赞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同年 8 月 8 日，他与敌秋、蔚凡（曙帆）^③两位好友共同建立了“共书社”，约定“以后买书合买，各出二元”^④。1921 年“五一”节，应修人与沈白梅、沈滨掌（彬章）、楼建南（适夷）、谢旦如等人在“共书社”基础上，正式创立“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馆藏书 138 种。^⑤他们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和《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章程》。其宣言道：

社会底进化由人类能不断地思想，而思想底传布和交换，

①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6 页。

②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 页。

③ 笔者未查到此两人的全名。

④ 《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 年，第 184—185 页。

⑤ 《四年来的作品》，《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 1 期（创刊号），1925 年 8 月。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读书与出版》第二年第 3 期，1947 年 3 月 15 日。

实靠着书报为多。要考察一地方底进化与否，只须访问地方底图书馆兴盛与否。近来改造社会家多肯着眼于出版事业，这原是最可喜慰的事；但于读者一方面却很少人顾虑。试问在现代私产制度底下的人们，能有充足的读书期么？能有充足的买书力么？谁也不敢下个肯定的答复。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掠夺阶级，这实非改造社会底初衷。我们因此，有这个通信图书馆底创设。创设之初，不能不把我们底两大希望，宣示大众：

一、我们希望成为远近人们底藏书库。只以邮筒往还，便能以余暇读爱读的书报，不受制于路途，不受制于经济，不受制于职务，也不受制于时间。

二、我们希望为大规模的上海图书馆底先导。上海人底羞耻原是不少，没有完美的公共图书馆，实为其最大的污点。撞晓钟，打更铎，我们不能诿诸他人的。

我们力虽无几，却很愿以这无几的力，尽用在这无人愿办的事业上。多认识几个有志读书者，多添我们几分感激；多借出几种有益的书报，便多添我们几分快慰。甚么毁誉，甚么劳瘁，不是我们所计及的。①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的《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志》，截至 1921 年，公共图书馆仅有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直到 1923 年该馆馆藏中仍无一本中文书刊。私营的、有限制开放的上海市商会商业图书馆是于 1921 年秋天开馆的。因此，应修人等人创办的上

① 《上海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宣言》，1921 年 6 月 22 日《民国日报·觉悟》。